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文明融合发展

■付正芸 冷树青

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应重视文明横向发展研究。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文明共同体是文明融合发展的主体,不同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与借鉴构成文明融合的基本方式,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则深刻揭示出文明融合发展的本质。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文明融合;文明共同体;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7-0038-04

付正芸(1976—),女,九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代化研究;冷树青(1962—),男,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南昌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研究”(课题编号10ZX0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人类社会系统整体性发展研究”(课题编号:ZX1006)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们通常习惯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无疑必须坚持的一般原则。倘若我们更进一步,以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积极借鉴全球史观的研究成果,注重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具体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与文明融合二者相互统一的内在逻辑,无疑将有益于深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其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所谓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是指历史进程由各地区间的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世界历史。它根源于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深刻揭示出一个原理,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人类

系统整体性的增强。

人类的发展充分表明,文明的区域发展由点而面不断扩散。人类首先诞生在非洲,火的使用使人终于走出温暖的大草原,逐渐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和美洲。此后,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各自成为古代文明时期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早期的古代文明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地的大河流域内。但古典文明却不断拓展,开始彼此接壤,至“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1](P83)}中世纪文明的融合发展又有新的突破,产生了若干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如伊斯兰教帝国,版图从西班牙延伸至中国边境,甚至到东南亚和非洲腹地。蒙古帝国的版图则更是包括中国、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这样,欧亚之间有可能产生直接的联系并相互影响。而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

则把人类带入“世界历史”时期,揭开了新的全球化进程的序幕。

唯物史观肯定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及其融合发展。安·拉布里奥拉曾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共同体间相互作用的思想作过以下概括:“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2](P111)这提示我们,社会基本矛盾既可以表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可以在更高的国际层次体现。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文明融合发展的根源。因为,“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矛盾”^[3](P115-116)。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整体性的逐步增强,必然不断促进文明融合水平的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中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P107-108)

世界历史理论则具体揭示了近代以来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276-277)。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性,它“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造成发达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3](P773)。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当代文明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人类文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人类系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但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文明共同体中。文明共同体及其关系构成人类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世界历史思想深刻表明,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与文明共同体间的互动内在统一,人类系统的横向

融合发展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借鉴性。

(一)文明融合发展的主体

关于文明,一般有两种界定:一是生命形态的文明,指一个人类共同体所表现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形态;二是人类共同体,它不仅包括独特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地缘—利益性质,或者说,文明是具有特定历史主体性和文化同一性的人类群体。^[4](P42)

文明的融合发展实质上反映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文明形态,即作为个体存在形式和利益载体的政治组织,从而导致不同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并存、互动以及一体化和整体性的发展趋势。因此,尽管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对于文明的融合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明融合发展的主体应为完整统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即人类共同体。这种人类共同体,具体表现为决定人类系统各个发展阶段性质和特点的政治共同体,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民族国家等。人类共同体自身演变的历史过程亦充分体现出文明从区域性存在走向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从文明融合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把人类共同体称之为文明共同体。

(二)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及其作用

文明融合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空间拓展,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具有必然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决定了文明共同体利益的客观性,而自然环境满足人类的需求相对有限,导致不同文明共同体间利益的冲突,产生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具体体现。

竞争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不同文明共同体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文明的区域性拓展和融合得以不断推进,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文明共同体。有关研究指出,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最早的五个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的狭小地区。在农耕世界的北边,可以说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这种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500年,这在农耕社会与农牧社会的三次大冲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5](P13-37)

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操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大入侵浪潮,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分别取

代了克里特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由此文明的区域也大大扩展了,向北延伸了约10个纬度。

第二次冲突大约发生于公元2—5世纪,由于匈奴西迁所导致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冲突卷入的部族最多,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人各支、斯拉夫人各支和闪族的阿拉伯人等。亚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被迫西移或南迁,从而导致了农耕世界的大入侵。结果分别导致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埃及文明的灭亡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伦理文明的产生。由于入侵的游牧民族皆被农耕文明同化,文明世界的区域范围又拓展了20多个纬度。

始于公元13世纪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第三次大入侵,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这次冲击虽然影响最大,但并没有能够改变已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如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继之而起的突厥人同样也没能改变西欧大陆的文明体系,相反更刺激了基督教文明的一系列内在变革。这样,到了公元15世纪,西欧大陆几乎到处都是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三) 文明共同体间的借鉴及其作用

文明的传播、交流和借鉴同样也不断促进着相互间的融合,这种借鉴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外来文明的传播,应能够适合本土文明的特点,方能为后者所认同,成为当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文明相互间的促进与融合。有学者指出:“一个历史共同体本着原有的文化基质,按自己的意志消化、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并最终超越之,从而形成更大的文明规模、获得更大的能量,是现今各文明的共同历程。”^{[4](P21)}

西欧封建制跳跃地主制发展阶段率先进入工业社会是继承借鉴与创新融合的典型。其时,西欧封建制正处于向地主制发展的转折中。^{[6](P109)}以中华地主制农业文明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发达而成熟,至明代前期,世界上重大科技成就约有300项,其中中华文明约有175项,一直到明代中后期,中西方文明的科技创新仍然各有千秋,不相上下。^{[7](P116-117)}阿拉伯文明则对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阿拉伯文明本身就是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波斯等农业文明的综合并发扬成长起来的,是多种文明相互交流与作用的结果,已经站在农业文明的较高阶段。另一

方面,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十分有利于对西欧传播东方先进文明。因此,阿拉伯人积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大约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同时,他们翻译了许多中世纪西欧几乎无人通晓的希腊文著作。由于希腊文明的传播,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8](P385-387)}正是因为外部文明的重要影响,西欧封建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一系列嬗变,实现了对农业社会地主制的跳跃发展,率先跨入工业社会。

三、当代人类文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一) 文明融合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存在和平与暴力两种基本方式。暴力方式的产生,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产生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但究其根源,在于缺乏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

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特征,即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社会一体化和整体性发展的重大跨越,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决定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物质基础的转变。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国际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市场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发展到生产一体化的更高阶段。

第二,支撑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价值理念的转变。它突出表现为对人类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世界各国利益相互交织,避免战争、追求和平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原则,只有加强各民族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缓和并化解矛盾,符合各自的利益。

第三,维系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政治新格局开始形成。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关系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统治。由于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民族国家间的合作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不同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

因此,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课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迫切要求民族国家间竞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在能源、资源、环境、文化、信息、疾病、毒品、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无疑是社会系统整体性发展的充分表现。德国学

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更是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贝克所说的风险,主要是指现代工业在不遗余力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系统的不可逆的副作用。它具有全球化的倾向,且施害者与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表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退化,更暴露出人类控制风险能力的局限和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

(二) 和谐世界: 文明融合的新理念

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9](P19)}列宁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追求和平的特定含义。他指出:“我们的‘和平纲领’应当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予的民主的和平。……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时还否认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10](P161-162)}

然而,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强,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具有新的特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也将是改良与渐进的方式,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客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势,在人类文明的互动融合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走和平、开放、借鉴与合作之路,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

和谐世界思想正是从人类发展整体性的高度,深刻把握文明融合发展的当代要求,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它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相继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鲜明的时代性,也涵盖了更多的人类共同价值,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观。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自觉适应了时

代要求,强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肯定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相互借鉴的重要性,坚持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繁荣,要求各个国家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不仅是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内政,还要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强调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和谐世界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途径,体现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

[参考文献]

- [1] (美)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 [M]. 吴象婴,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意) 安·拉布里奥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沅炜. 文明的表现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5] 赵林. 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6] 高德步. 世界经济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7] 朱宁. 变乱中的文明: 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8] 马克思. 世界文明史(第1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列宁全集(第2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责任编辑: 龚剑飞】